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王 韬 鲁元平*

摘 要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的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的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 收入不平等, 社会犯罪, 主观幸福感

一、引 言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李实和佐藤宏,2004),无论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赵人伟等,1999;蔡昉,2003;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还是城市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Ravallion and Chen, 2007)。以上研究都是直接利用客观经济数据测算出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对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的主观数据分析发现,调查者中有83%的居民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太大,80%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这说明从居民主观感知而言,我国的收入差距依旧过大。那么,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呢?¹如果存在的话,那么收

*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鲁元平,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财政金融管理系313室;电话:13545290188;E-mail: yuanpinglu@gmail.com。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073059)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9YJA790078和09YJA790079)的资助。作者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张克中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庄佳强讲师以及冯俊诚、江求川、叶文奇和何凌云博士的宝贵意见。本文在“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宣讲时得到了张曙光教授、杨春学教授和范子英副教授的有益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文的部分数据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盖乐普中国的帮助,在此一并谢过。作者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极富教益的评论和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¹ 本文中,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表示相同的含义,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可以混合使用。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已从1990年的7.29分下降到2007年的6.76分,甚至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入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正是基于这些问题,试图考察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主观心理效应而非客观经济效应。²那么,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我国居民幸福呢?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居民表现出的收入不平等厌恶。由于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低,较低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使得它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态平和程度,导致心理失衡和强烈的失落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犯罪因素,这些犯罪活动又会进一步对居民的幸福感和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作为国内较早考察收入不平等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前人的研究或者只考虑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或者只考虑社会犯罪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少同时考虑两者的影响,而且缺乏收入不平等对国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研究。而本文将同时考虑这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并试图找到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渠道,这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2)本文考察了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了“相对收入”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此外,结合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其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都丰富了幸福经济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3)当前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跨国研究,我们采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比如文化和制度等因素)。而且本文用四次调查的数据,避免一次调查所可能存在的偏误问题,从而有利于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第四部分为实证回归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² 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依据他国的经验我国已进入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高发期,在这一阶段对国民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发达国家,如法国已经于2008年开发了国民心理账户,开始关注民众的幸福感状况,并将其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和依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5日正式宣布,展开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巴西2010年通过19号宪法修正案,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做得最为彻底的是不丹,该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并使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代替传统GDP,成为最早实施“幸福工程”的国度。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国家，它是伴随着生活质量和社会指标运动而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而经济学最近对幸福的研究呈现“后来者居上”的态势。经济学家早期主要是从微观视角对幸福进行研究，主要考察个体特征变量，比如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健康、教育程度和就业状态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近些年来，他们开始把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幸福方程，比如考察失业率（Di Tella *et al.*，2001；Frey and Stutzer，2002）、通货膨胀率（Di Tella *et al.*，2003；Sanfey and Teksoz，2007）、政府支出（Wassmer *et al.*，2009；Ram，2009）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³其中，收入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成为幸福经济学关注的热点之一。

国内外有关收入不平等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首先，直接效应有两种。其一，纯粹的收入不平等厌恶。人类与生俱来具有不平等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的社会偏好，这个观点在人类学（Fehr and Schmidt，1999）、行为科学（Kahneman *et al.*，2006），甚至神经科学⁴（Tricomi *et al.*，2010）中都已得到证实。在经济学文献中，Morawetz（1977）最早证实了人类具有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以色列两个收入不平等程度悬殊的相邻小村庄（各有40—50户）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发现，生活在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的社区（虚拟变量）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更高。Schwarze and Harpfer（2002）利用德国1985—1998年间的社会经济面板数据（GSOEP）进行研究。他们分析联邦德国75个地区的Gini系数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运用有序概率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Gini系数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效应显著为负，而且无论被调查者是穷人还是富人，也就是说德国人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厌恶。通过类似的方法，Alesina *et al.*（2004）和Ebert and Welsh（2009）分别对欧美和欧洲十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总之，正是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收入不平等厌恶，使得过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

³ 本文的文献综述中将不涉及个人特征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Oswald（1997）和Blanchflower（2007）等文献对此有很好的综述，其结论认为具有已婚、高收入、白人、女性、受过良好教育、自我雇佣者（self-employed）等特征的个体主观幸福感较高。关于宏观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鲁元平和王韬（2010）有系统的综述。

⁴ 神经科学家通过功能性MRI直接测定人类大脑存在不平等厌恶倾向。对动物的实验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比如动物学家对非洲黑猩猩的试验发现，两只表现相当的猩猩，当其中一只分配的食物要明显多于另一只时，那么所得较少的那只猩猩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懑，甚至放弃自己原本得到的食物，什么都不吃。

影响。

其二,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⁵(social mobility sense)。收入不平等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积极的因素,因为它可以促进收入流动性的增强,导致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而不是依赖于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等因素,实现收入不断增长。那么个体将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机遇,这会对个体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从而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Alesina *et al.* (2004) 将欧美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差异归结为流动性感知的差异:“……在美国,穷人将不平等视为一个阶梯,虽然陡峭,但是可以往上攀登;而在欧洲,居民将其视为收入上升(或流动)的障碍。”美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欧洲的收入流动性,这传达出了更多预测未来收入的信息,促进美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对欧洲居民而言,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则是有害的。Milanovic *et al.* (2008) 发现,社会转型期国民可以容忍甚至接受收入不平等,因为收入不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快速摆脱落后和贫困、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很显然,收入不平等的“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关键取决于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总之,社会流动性可以作为收入不平等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其次,间接效应有一种,即收入不平等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地影响居民幸福感。亚当·斯密(2003)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那么“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者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人的财产,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社会学家默顿也曾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⁶实证研究方面,Demombynes and Ozler (2005)、Jongmook Choe (2008) 以及胡联合等(2005)、白雪梅和王少瑾(2007)、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等研究都发现收入差距(Gini系数)越大,违法犯罪活动越多。

在收入不平等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地影响居民幸福感这个逻辑链条中,如果社会犯罪确实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话,这将为本文进一步考察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提供经验基础。长期以来,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领域,心理学家

⁵ 在本文中,我们没有对收入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进行区分,不过实际上,社会流动性是比收入流动性含义更加广泛的一个概念,收入流动性是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表现。

⁶ 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犯罪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1) Becker(1968)提出的犯罪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收入不平等高的地区,穷人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回报很少,如果把时间用于从事犯罪则可能增加回报;(2) Merton(1938)提出的压力理论,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让不成功者感受到某种压力,从而使其从事犯罪活动;(3) Shaw and McKay(1942)提出的社会紊乱理论,不平等过高可能导致社会控制机制较弱,犯罪就会发生。吴一平和芮萌(2010)对此有过系统阐述。

们研究发现受过犯罪侵害或者长期生活在高犯罪发生率地区的居民，会表现出显著和持续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压力紊乱以及情感上的敌视等 (Davis and Friedman, 1985; Sorenson and Golding, 1990; Norris and Kaniasty, 1992)。这些心理问题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Michalos, 2000)。经济学文献中，Alesina *et al.* (2004) 在考虑收入不平等对美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加入了社会犯罪率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地区的谋杀率与美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而且对富人群体很显著。Nattavudh Powdthavee (2005) 使用南非公安部门公布的地区犯罪率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回归发现，地区的犯罪率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afael Di Tella and Ernesto Schargrotsky (2009) 和 Simon Davies and Tim Hinks (2009) 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表明，社会犯罪确实对居民的幸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犯罪之间的正向关系较为明确，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通过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地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这个逻辑链条可能真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对中国居民而言，在直接效应中到底是纯粹的收入不平等厌恶占主导地位，还是收入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感知占主导地位？这也即是说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到底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间接效应中，收入不平等通过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对幸福感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条路径是否确实存在？这些问题都有待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进行检验。

三、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 实证模型

参考 Di Tella *et al.* (2003) 和 Alesina *et al.* (2004) 等相关研究，本文采用 Ordered Logit Model 来分析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text{Happy}_{ist} = \alpha \text{Inequality}_{st} + \beta \text{CRIME}_{st} + \theta \text{MACRO}_{st} + \gamma \text{MICRO}_{ist} + \eta_s + \mu_t + \varepsilon_{ist}, \quad (1)$$

模型 (1) 中，解释变量 Inequality_{st} 表示 s 省 t 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用该省 t 年的 Gini 系数 (GINI) 来度量⁷； CRIME_{st} 表示 s 省 t 年的社会犯罪状况，用该省刑事案件发生率 (起/十万人) 来表示；向量 MACRO_{st} 和 MICRO_{ist} 分别表示那些被前人研究证实的、能够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和微

⁷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分组数据是单列的，难以直接测算某省城乡合一的 Gini 系数，所以我们参考 Sundrum (1990) 的算法计算得到本文 Gini 系数，其计算方法请参见附录 1。

观层面的个体特征变量。MACRO_{st}表示s省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包括通货膨胀率(INFLA)以及失业率(UNEMP)。MICRO_{ist}表示s省t年第i个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SEX)、年龄(AGE)、教育水平(EDU)、婚姻状况(MARI)、就业状况(EMPL)、自评健康状况(HEALS)和家庭相对收入等级(INCOMS)。η_s表示省际虚拟变量,当样本属于该省时则η_s=1,否则η_s=0。μ_t表示年度虚拟变量,当调查是在该年进行的时则μ_t=1,否则μ_t=0。ε_{ist}表示该回归模型的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Happy_{ist}表示s省t年第i个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时的问题是:“将所有情况都考虑进来,目前您生活得幸福吗?”要求被调查者从数字1到4之间进行选择,1表示最不幸福,4表示最幸福。⁸Happy_{ist}^{*}低于一定临界值(C₁)时,调查者会感到“最不幸福”,高于临界值C₁但低于临界值C₂时,会感到“不幸福”,以此类推,当Happy_{ist}^{*}高于临界值C₃时,会感到“最幸福”。由于Happy_{ist}是潜变量(latent variable),我们无法观察和得到这些临界值,但我们能够获得被调查者的回答(Happy_{ist}^{*}),回答“最不满意”时取1,回答“最满意”时取4,即

$$\begin{aligned} \text{Happy}_{ist} &= 1, & \text{如果 } \text{Happy}_{ist}^* < C_1; \\ \text{Happy}_{ist} &= 2, & \text{如果 } C_1 \leq \text{Happy}_{ist}^* < C_2; \\ \text{Happy}_{ist} &= 3, & \text{如果 } C_2 \leq \text{Happy}_{ist}^* < C_3; \\ \text{Happy}_{ist} &= 4, & \text{如果 } C_3 \leq \text{Happy}_{ist}^*. \end{aligned}$$

在模型(1)中,假定ε_{ist}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如果用φ(·)表示其累积分布函数的话,那么被解释变量Happy_{ist}的分布可以表达如下:

$$\begin{aligned} \Pr(\text{Happy}_{ist} = 1) &= \phi(C_1 - X\beta)C, \\ \Pr(\text{Happy}_{ist} = 2) &= \phi(C_2 - X\beta) - \phi(C_1 - X\beta), \\ \Pr(\text{Happy}_{ist} = 3) &= \phi(C_3 - X\beta) - \phi(C_2 - X\beta), \\ \Pr(\text{Happy}_{ist} = 4) &= 1 - \phi(C_3 - X\beta). \end{aligned}$$

通过构造每一种回答(即1为最不幸福,4为最幸福)的似然函数,利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出参数α、β、θ以及γ。在这个设定中,只要随机误差项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出来的参数将是一致估计量。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中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和个体特征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

⁸ 1到4意味着数字从小到大依次表示满意度增强,但这只是序数意义上的,例如,我们不能说,4和2之间生活幸福感的差距是2和1之间差距的两倍。

(WVS), WVS 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四次,分别是在 1990 年、1995 年、2001 年和 2007 年进行的。这四次调查分别委托了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1990 年)、盖洛普中国(1995 年)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1 年和 2007 年)来组织实施。⁹这几个调查组织利用 GPA/GIS 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来进行调查,调查的样本涉及中国 24 个省、市或自治区。调查者根据村/居委会的户籍资料随机抽取 18—70 岁的人作为受访者,1990 年得到有效样本 1000 份,1995 年 1500 份,2001 年 1000 份,2007 年 2015 份,总共 5515 份。宏观经济变量中各省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数据通过 1991 年、1996 年、2002 年和 200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收入不平等是利用 Sundrum (1990) 方法,通过计算 1991 年、1996 年、2002 年和 2008 年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得到。各省的刑事犯罪数据是通过 1991 年、1996 年、2002 年和 2008 年的《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获得,由于有少数省份的刑事犯罪数据难以通过年鉴得到,我们逐一向该省的公安厅电话咨询该省该年的刑事犯罪数据情况,从而最终得到本文的刑事犯罪数据。表 1 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2 描述了我国居民总体的幸福感状况。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1 表示最不幸福,4 表示最幸福	2.887	0.798	1	4
性别	1 表示男,2 表示女	1.498	0.500	1	2
年龄	岁	42.278	13.298	18	70
婚姻状况 ^①	见注	1.721	1.718	1	4
教育水平 ^②	见注	3.947	2.439	1	9
就业状态 ^③	见注	2.265	2.121	1	8
自评健康状况	1 表示很差,5 表示很好	3.779	1.025	1	4
自评收入等级	1 表示最低等,10 表示最高等	3.671	2.679	1	10
失业率	该省的失业率(%)	0.033	0.009	0.01	0.065
通货膨胀率	该省的通货膨胀率(%)	0.0355	0.0205	-0.013	0.064
收入不平等	该省的 Gini 系数	0.3854	0.1085	0.23	0.61
社会犯罪	该省刑事案件发生率(起/十万人)	344.23	158.79	122	838

注:① 婚姻状况:1 表示已婚,2 表示离异,3 表示丧偶,4 表示单身;② 教育水平:1 表示没有正式教育,2、3 表示初等教育(2 没有完成,3 完成),4、5 表示中等教育(4 没有完成,5 完成),6、7 表示职业教育(6 没有完成,7 完成),8、9 表示大学教育(8 完成没有学位,9 完成有学位);③ 就业状态:1 表示全职,2 表示兼职,3 表示自我雇佣,4、5、6 表示离开劳动力市场(离退休、学生、家庭主妇等),7 表示失业。

表 2 显示,对于所有人而言,“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个体分别占

⁹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是世界银行资助的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Ronald Inglehart 主持的世界性调查,它的调查问卷涉及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等问题,该调查数据是完全免费和公开的,它已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所公认的权威数据。该调查的中国部分,由于有些数据比如户籍、地区信息等在世界价值观调查免费的数据库中没有包括,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盖洛普中国免费为笔者提供了这些调查数据,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20.81%和54.18%，其和占到74.99%，说明我国居民总体而言比较幸福。失业者报告自己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重与总体比较约少了15%，报告“不很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比重则相应增加了15%。已婚者报告自己“非常幸福”要比离异者高出12.51%，这与大多数幸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农村居民要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高，其报告“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要比城市高2.24%和2.42%。收入等级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收入最低者报告其主观幸福感为“比较幸福”和“不幸福”的比重要明显地低于和高于其他的收入等级。

表2 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主观幸福感	所有人	失业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已婚	离异	农村	城市
非常幸福	20.81	11.86	25.38	12.87	20.57	18.33
比较幸福	54.18	48.32	52.11	43.59	59.61	57.19
不很幸福	21.75	32.76	20.09	38.01	17.43	21.08
非常不幸福	3.26	7.06	2.42	5.53	2.39	3.40
主观幸福感	收入等级					
	最低	较低	中等	高等	最高	
非常幸福	15.72	21.13	20.55	19.21	18.73	
比较幸福	45.87	48.49	60.96	65.82	60.52	
不很幸福	32.59	26.77	16.33	13.96	19.82	
非常不幸福	5.82	3.61	2.16	1.01	0.93	

注：所有的数据都是以百分数(%)表示的；表2中的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是根据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样本计算得到的，其原因在于1990年的户籍变量数据不能获得。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3给出了计量模型(1)的Ordered Logit模型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我们从表3的回归式(1)开始分析，该列仅仅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变量，笔者对其回归结果进行简要的分析，这有利于将本文的结论与前人进行比较，毕竟目前经济学对幸福感的研究依旧主要是经验性的。

表3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1)	(2)	(3)	(4)	(5)	(6)
A: 宏观经济变量						
GINI		-1.369*** (0.386)	-0.768** (0.372)	-0.763** (0.433)	-4.094*** (0.861)	-0.581** (0.283)
		-0.051	-0.031	-0.030	-0.072	-0.028
CRIME			-7.8e-4* (4.13e-4)	-7.5e-4* (4.25e-4)	-3.87e-4 (3.42e-4)	-2.99e-3** (1.43e-3)
			-0.017	-0.016	-0.009	-0.031

(续表)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1)	(2)	(3)	(4)	(5)	(6)
INFLA				-5.126** (2.407)	-7.283*** (2.423)	-5.420** (2.663)
UNEMP				-0.751 (4.563)	-0.327 (4.698)	-1.796* (1.068)
B:个体特征变量						
AGE	-0.057*** (0.017)	-0.056*** (0.018)	-0.054*** (0.018)	-0.055*** (0.018)	-0.076*** (0.025)	-0.110*** (0.037)
AGE ²	0.0008*** (0.000)	0.0007*** (0.000)	0.0008*** (0.000)	0.0008*** (0.000)	0.0011*** (0.000)	0.0014*** (0.000)
MALE	-0.156** (0.064)	-0.159** (0.064)	-0.159** (0.064)	-0.154** (0.064)	-0.313*** (0.093)	-0.215* (0.127)
Married (Reference)						
DIVO	-0.559*** (0.199)	-0.566*** (0.197)	-0.576*** (0.198)	-0.585*** (0.198)	-0.672*** (0.263)	-1.428*** (0.495)
WIDO	-0.388*** (0.105)	-0.373*** (0.105)	-0.393*** (0.105)	-0.399*** (0.105)	-0.346** (0.170)	-0.764*** (0.291)
SING	-0.261 (0.132)	-0.218 (0.134)	-0.235 (0.134)	-0.283 (0.174)	-0.264 (0.175)	-0.299 (0.538)
Full time job (Reference)						
PARTJ	0.077 (0.112)	0.116 (0.113)	0.142 (0.114)	0.148 (0.114)	0.236 (0.149)	0.201 (0.360)
SELFE	0.114 (0.137)	0.083 (0.138)	0.078 (0.139)	0.101 (0.137)	0.538*** (0.213)	0.138 (0.386)
UNEMP	-0.454*** (0.122)	-0.417*** (0.122)	-0.429*** (0.120)	-0.446*** (0.164)	-0.263 (0.237)	-1.199*** (0.364)
OUTLA	-0.198*** (0.064)	-0.192*** (0.064)	-0.188*** (0.064)	-0.181*** (0.033)	-0.032 (0.129)	-0.381*** (0.077)
No formal education (Reference)						
PRIS	0.141 (0.070)	0.135 (0.070)	0.127 (0.070)	0.127 (0.070)	0.143 (0.108)	0.172 (0.148)
HIGHS	0.303*** (0.069)	0.292*** (0.069)	0.285*** (0.069)	0.220*** (0.044)	0.348*** (0.122)	0.387*** (0.124)
UNIV	0.493*** (0.118)	0.365*** (0.116)	0.329*** (0.115)	0.336*** (0.128)	0.386*** (0.141)	0.619*** (0.231)
Poor health level (Reference)						
FAIRHE	0.908*** (0.116)	0.883*** (0.116)	0.886*** (0.116)	0.892*** (0.116)	0.986*** (0.155)	0.813*** (0.299)
GOODHE	1.376*** (0.112)	1.358*** (0.111)	1.364*** (0.111)	1.369*** (0.111)	1.678*** (0.148)	1.386*** (0.298)
BESTHE	2.195*** (0.125)	2.161*** (0.125)	2.162*** (0.125)	2.154*** (0.125)	2.615*** (0.172)	2.685*** (0.356)

(续表)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1)	(2)	(3)	(4)	(5)	(6)
Lowest income level (Reference)						
LOWINC	0.089 (0.086)	0.078 (0.086)	0.076 (0.086)	0.079 (0.086)	0.393*** (0.120)	0.337 (0.271)
MIDINC	0.329*** (0.083)	0.334*** (0.083)	0.335*** (0.083)	0.324*** (0.084)	0.741*** (0.119)	0.581*** (0.182)
HIGINC	0.456*** (0.098)	0.483*** (0.099)	0.514*** (0.099)	0.486*** (0.101)	0.963*** (0.145)	0.741*** (0.272)
Prov Dumm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Dumm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5 406	5 406	5 406	5 406	3 192	1 227
Wald chi2	541.07	555.45	585.51	596.73	493.09	247.84
Pseudo R ²	0.1591	0.1607	0.1617	0.1621	0.1123	0.1207

注:本表给出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 Ordered Logit 模型的估计系数;圆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性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GINI 和 CRIME 标准误下面的数值表示这两个变量变化一个标准差时,报告自己“很幸福”个体的比例变化;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回归结果,由于1990年的问卷调查中没有城乡户口的相关信息,因此在城乡回归中只包括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样本;Year Dummy 包括1995年、2001年和2007年三个 Dummy;***、**、* 分别表示在1%、5%及10%统计水平下显著。

回归式(1)显示,年龄(AGE)和年龄的平方(AGE²)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和为正,这说明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下降而后上升,两者之间呈U形的关系。男性虚拟变量(MAL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我国的男性没有女性幸福。婚姻状况(MARITAL)的结果表明已婚者的幸福感要显著地高于离异(DIVO)和丧偶(WIDO)者。失业(UNEMP)或离开劳动力市场(OUTLA)会产生较大的不幸福感,正如Clark(2008)所言,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超过任何其他因素,包括离婚和分居等消极因素。教育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受过高中(HIGHS)和大学(UNIV)教育的个体主观幸福感要显著地高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个体。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那些认为自己身体一般(FAIRHE)、较好(GOODHE)和很好(BESTHE)的人的幸福感要比认为自己身体差的人高出很多,它是最为显著的特征变量之一。自评收入等级对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 Frank(2007)指出,幸福感更多的来自于自己的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较,炫耀和攀比是获得满足感的重要源泉,绝对收入只起到较小的作用。(1)式显示中等收入者(MIDINC)和高等收入者(HIGINC)的幸福感要显著地高于低收入者。所有这些结论看起来都很合理,并且与大多数幸福经济学文献相一致。

在回归式(2)中,我们加入收入不平等变量(GINI)后发现,Gini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比较(2)一(6)列的回归结果,笔者在重点分析的宏观经济变量(GINI和CRIME)的标准误下面添加了另外一个数值:

该数值的含义是指当该数值为负（或正）的时候¹⁰，表示 GINI 和 CRIME 变化一个标准差时，个体离开（或进入）最高幸福等级——“非常幸福”和随即进入（或离开）剩下的两个低幸福等级——“比较幸福”、“不是很幸福”的比例。¹¹具体而言，收入不平等增加一个标准差（大约等于 11%）的话，导致报告自己“很幸福”的个体比重下降 5.1 个百分点，导致报告自己“不幸福”的个体比重增加 2.7 个百分点。由于 20.81% 的中国居民报告其“很幸福”，那么收入不平等增加了一个标准差的话，可以预期这将会使得整个中国居民报告其主观幸福感为“很幸福”的比重下降 24.5%（=5.1%/20.81%）。由于有 24.01% 的中国居民报告其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为“不很幸福”，那么收入不平等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使那些报告自己“不幸福”的居民比重相应地增加 12.3%。

从经济学的直觉可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效应。这个结论意味着我国居民对收入不平等度的容忍度确实较低，对收入不平等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从而使其对居民的幸福感的较大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正如前文所讲，由于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居民具有的收入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现实中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个结论同时也表明，通过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在我国并不存在。¹²

回归式（3）中，我们加入了另外一个宏观经济变量——社会犯罪率（CRIME）。结果显示，社会犯罪率的系数为负并且在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社会犯罪对居民的幸福感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关于社会犯罪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大小，表 3 显示，社会犯罪率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等于 159）将会使得报告自己的主观幸福感为“很幸福”的个体比重下降 1.7 个百分点，使得报告自己“不幸福”的个体比重增加 1.1 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居民报告其幸福感为“很幸福”的比重下降 8.17%（从 20.81% 下降到 19.11%），报告为“不幸福”的居民将会增加 4.4%（从 25.01% 增加到 26.21%）。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社会犯罪具有明显的负的外部性，地区犯罪率的上升导致大众心理恐惧感、不安全感甚至是不信任感增加，经常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种紧张的情绪导致居民心理健康状态下降，

¹⁰ 对于有序 logit 模型而言，可以通过变量的系数计算出它的概率。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以参见 Rainer Winkelmann and Stefan Boes(2006)或 A. Colin Cameron and Pravin K. Trivedi(2005)。

¹¹ 通过表 1 可知调查报告自己“很不幸福”的比率很低，只占到总样本的 3.84%，因此在实证回归中，作者将其与报告“不是很幸福”的个体合并在一起进行回归，统称为“不幸福”。

¹² 其实，陈钊和陆铭(2009)、王洪亮(2009)等都指出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在近十几年来呈显著下降趋势，我国已是一个收入流动性较低的国家。因此，在我国不存在通过收入不平等促进收入的流动性，进而促进幸福感提高这条路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从而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

加入 CRIME 之后,GINI 的系数下降了大约 43.9%,显著性水平也从 1%降到 5%,这表明在没有加入社会犯罪的情况下高估了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犯罪可能是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鉴于胡联合等(2005)、白雪梅和王少瑾(2007)、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等学者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发现,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显著地导致了社会犯罪率的提高。那么本文得出社会犯罪是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传导机制这个结论,也就是可能的了。为了进一步考察收入不平等—主观幸福感联系中有多少是由社会犯罪传导的,本文参考 Mo(2001)的传导机制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收入不平等导致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关系中,有 57.3%是由于社会犯罪率的增加导致的。¹³这表明,社会犯罪确实是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重要的渠道。不过,收入不平等依旧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社会犯罪只是收入不平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渠道之一,收入不平等自身或者其他的渠道依旧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回归式(4)中,我们又加入了两个幸福经济学中通常都会控制的宏观经济变量——通货膨胀率(INFLA)和失业率(UNEMP)。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前面的结论没有太大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依旧显著为负。通货膨胀率自身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失业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回归式(5)和(6)分别为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无论是对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社会犯罪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都有负面影响,但是只对城市居民显著。回归式(5)和(6)是用城乡合并的收入不平等指数进行回归的,但局部范围的收入差距可能更具有可比性,所以下一部分将用城乡各自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对其样本进行回归。

¹³ 参考 Mo(2001)的方法,我们先对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分解: $\frac{d\text{Happy}}{d\text{GINI}} = \frac{\partial\text{Happy}}{\partial\text{GINI}} + \left(\frac{\partial\text{Happy}}{\partial\text{CRIME}} \frac{\partial\text{CRIME}}{\partial\text{GINI}} \right)$ 。在控制了通货膨胀、失业率以及省际和年度虚拟变量之后,用收入不平等对社会犯罪率进行回归,发现收入不平等的系数为 1321.275,并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依据回归结果,可以求得收入不平等通过社会犯罪渠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 $(-7.8e-4) \times (1321.275) = -1.0306$,由于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为 -0.768 ,那么可以得到社会犯罪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为 57.3% $(= -1.0306 / [(-1.0306) + (-0.768)])$ 。当然,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负面影响还有 42.7%没有得到解释,可能是收入不平等自身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如文献综述中所阐述的,是人类与身俱来的对不平等的厌恶。本文认为社会犯罪已经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 57.3%,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效应,所以我们也无意深究其他的传导机制,不过这可以作为下一篇文章继续研究的课题。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二)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该部分我们按照户籍差异，将总样本分拆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出于城乡比较的目的，城乡各自回归中均采用与表3相同的解释变量。唯一不同的是，用城乡各自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对自身样本进行回归。参照全样本分析，在此也采取分步回归的方法，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的基础上，先后加入了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以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由于篇幅的限制，在这里只给出宏观经济变量的回归结果。个体特征变量、年度和省际虚拟变量都已控制。

首先，对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表4显示，城乡居民都受到了收入不平等的显著负面影响，但是它对农村居民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城市居民。回归式(3)表明收入不平等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使农村居民报告其主观幸福感为“非常幸福”的比重下降20.90% (=4.3%/20.57%)，以及报告其为“不幸福”的比重增加18.67% (=3.7%/19.82%)。而(6)式显示对城市居民相应的比重分别为7.64%和4.2%，比农村居民都要低很多。究其原因可能在于：(1)我国农村依旧具有费孝通所称的“熟人社会”的特征，

表4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1)	(2)	(3)	(4)	(5)	(6)
A:个体特征变量(已控制)						
B:宏观经济变量						
GINI	-3.567*** (0.731)	-3.488*** (1.018)	-3.453*** (1.018)	-0.885** (0.432)	-0.572* (0.337)	-0.559* (0.332)
	-0.056	-0.049	-0.043	-0.024	-0.017	-0.014
CRIME		-3.65e-4 (3.77e-4)	-4.19e-4 (3.92e-4)		-2.16e-3** (1.02e-3)	-1.89e-3** (9.54e-4)
		-0.008	-0.011		-0.033	-0.028
INFLA			-7.133*** (2.507)			-5.346** (2.613)
UNEMP			-0.477 (4.628)			-1.643* (0.972)
Prov Dumm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Dumm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3 192	3 192	3 192	1 227	1 227	1 227
Wald chi2	499.42	499.53	501.17	245.21	245.59	247.84
Pseudo R ²	0.1150	0.1150	0.1156	0.1229	0.1229	0.1230

注：由于1990年的问卷调查中没有城乡户籍相关的信息，因此在城乡回归中是对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样本回归；Gini系数分别用城乡各自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本表给出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Ordered 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圆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性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分别表示在1%、5%及10%统计水平下显著。

一个村的农民相互认识,对彼此的收入状况和收入差距比较了解,相互之间容易进行攀比,在“熟人社会”中“相对收入”效应更加明显。比如,上海居民的高收入可能对贵州居民的幸福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某贵州居民的收入要远低于其邻居的话,那么这种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2) 非农收入造成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农村收入差距一直高于城市(Yao and Zhang, 2001),从而导致它对农村居民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城市居民。(3) 外出务工、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信息的广泛交流等因素,使得农民常常将自己的收入状况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导致农民在心理上出现了巨大的落差,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相对而言,由于城市基本上算是“匿名社会”,“相对收入”效应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城市居民由于收入普遍要高于农村居民,他们本身就处于“相对收入”效应中的优势地位,所以其负面效应相对而言要小很多。

其次,社会犯罪率的结果显示,它只在城市样本回归时显著为负,对农村样本回归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社会犯罪率仅仅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农村居民并未受其显著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比较城乡的社会犯罪系数发现,它对城市居民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主要的解释是,随着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跨省流动人口激增,内地落后地区的人口大量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及省内大中城市积聚,使得一个省的犯罪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快速扩张的城市化给城市的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所以城市居民容易受到犯罪所带来的心理冲击。相对而言,在农村犯罪的收益较小,使得农村的犯罪率相对较低,农村居民对刑事犯罪并无太多感知,所以社会犯罪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¹⁴

宏观经济控制变量中,通货膨胀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本相似,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有趣的是,失业率对农村居民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对城市居民却是显著为负。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居民是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济形势差的情况下回乡务农,这种“进可去城里打工,退可回农村种田”的工作方式使其对失业率并没有太多的认知,而城市居民对失业率却有较强烈的感受。

(三)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本部分试图考察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幸福感的影

¹⁴ 不过,这里有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中国农村部分基本上选择那些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居民来访问,所以本文的样本中农民工不多,如果将农民工加入农村样本的话,也许结果会有所差异。因为农民工也是长期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居民,他们在心理上的认知与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是有差异的。当然,这里还有个缺陷就是,我们无法区分这些罪是城市人还是进城农民所犯的,因为对于犯罪来源的数据我们无法获得。

响是否有显著差异。¹⁵ 本文收入等级的分类依据是，按照 WVS 调查问卷的问题：“如果将全国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十等分，1 表示家庭收入最低层，10 表示家庭收入最高层，您的家庭收入水平属于？”依据被调查者的回答，我们将回答 1—2 的家庭视为最低收入等级（占 21.25%），回答 3—4 的家庭视为低收入等级（占 27.11%），回答 5—7 的家庭视为中等收入等级（占 35.69%），回答 8—10 的家庭视为高收入等级（占 15.95%）。

从回归式（1）可以看到，收入不平等对最低收入等级居民的幸福感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于最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与 GINI 交互项（ $GINI \times LOW-IN$ ）的系数为正，其含义表明收入不平等对较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小，但这个结论不显著。中等收入者与 GINI 交互项（ $GINI \times MIDIN$ ）、高等收入与 GINI 交互项（ $GINI \times HIGIN$ ）的系数都在 1% 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收入不平等对中高等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地小于最低收入者。而且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对高等收入者幸福感的总效应为： $\partial SWB / \partial GINI = -2.819 + 2.977 = 0.156 > 0$ ，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对高收入者产生了积极而非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相对收入”效应的存在，幸福经济学的经典结论表明居民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Easterlin, 2001）。由于在收入比较的阶梯上，高收入者已经站在顶端，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意味着财富更加集中，富者更富、贫者更贫，高收入者在“相对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心理上能够得到较大的满足感。相反，低收入者与他人比较处于弱势地位，这往往会降低其幸福感。

（2）式加入了社会犯罪与收入等级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犯罪对最低收入者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较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等收入者与社会犯罪的交互项系数都为正，而且中高等收入者在 5% 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社会犯罪对中高等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地小于最低收入者，不过其总效应依旧为负。这与 Kingdon and Knight（2003）得出的地区犯罪率对穷人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富人的结论相一致。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低收入者没有太多的经济能力来应付犯罪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较容易受到社会犯罪的伤害。不过社会犯罪对高收入者幸福感依旧有负面影响，原因可能是前面提到的，社会犯罪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而且当前的许多刑事犯罪是针对富人的，比如偷窃、绑票等都呈现出明显的仇富特征，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肯定会对富人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式同时加入了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与收入等级的交互项，回归显示其结论没有显著差异。

¹⁵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除了全样本回归之外,我们还分别考虑了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城市和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首先,表5的(4)—(9)列显示,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的幸福感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农村居民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城市居民,这与表4的结果基本相同。中等和高等收入者与Gini系数的交互项都显著为正,而且收入不平等对高等收入者的总影响为正,这一结论对于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都是一致的。其次,对城市居民而言,社会犯罪依旧显著为负,它对中等和高等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地小于最低收入者。对农村居民而言,社会犯罪对各种收入等级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负但都不显著,这与表4的结论基本一致。由于其原因在前文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检验:首先,检验本文的数据是否存在结构性的变异。虽然本文的样本是随机抽样得到的,但是调查时间从1990—2007年,间隔较长,我国居民有可能对幸福感和不平等的理解出现结构性的变动,从而使得用四次调查数据的混合回归结果有偏。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每一次调查的数据进行回归,四次回归结果显示,本文所关注的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除了系数大小不同外,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表明本文利用混合回归得到的结论是可信的。

其次,我们利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对其进行检验。以上实证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而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将用“生活满意度”取代“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调查时的问题是:“将所有情况都考虑进来,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调查者可以从数字1到10进行选择,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Kahneman *et al.* (2006)说明了这样选择的理由,他认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是反映人心理的积极状态,它们具有相同并且一致的本质特性,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出现“生活很满意”但“很不幸福”的人。所以,本文用来自同一份问卷中的“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前文的结果进行检验。稳健性回归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率对于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加入社会犯罪率之后,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下降。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之外,还可能由于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与用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在较高程度上吻合,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说服力。¹⁶

¹⁶ 由于篇幅的缘故,作者在此不给出具体的实证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5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全样本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A: 个体特征变量 (已控制)									
B: 宏观经济变量									
GINI	-2.819*** (0.733)	-0.788** (0.398)	-3.344*** (0.917)	-0.681** (0.344)	-0.607** (0.303)	-0.599** (0.301)	-3.501*** (1.056)	-3.379*** (1.281)	-3.261** (1.379)
CRIME	-5.74e-4** (2.44e-4)	-1.36e-3*** (4.02e-4)	-7.49e-4** (3.72e-4)	-2.19e-3*** (8.41e-4)	-3.49e-3*** (1.31e-3)	-2.32e-3** (1.12e-3)	-2.51e-4 (3.92e-4)	-2.64e-4 (5.93e-4)	-3.42e-4 (7.62e-4)
INFLA	-5.715** (2.703)	-6.752** (2.721)	-5.339** (2.630)	-4.677** (2.363)	-4.986** (2.491)	-4.521** (2.287)	-7.671*** (2.774)	-7.823*** (2.781)	-7.422*** (2.819)
UNEMP	-1.246 (3.881)	-2.623 (3.926)	-1.057 (3.961)	-1.994* (1.201)	-1.779* (1.024)	-2.898** (1.278)	-0.596 (1.383)	-0.614 (1.397)	-0.583 (1.332)
GINI×LOWIN	0.905 (0.804)	1.709 (1.150)	0.272 (1.150)	0.243 (0.243)	0.272*** (0.721***)	0.311 (0.328)	1.855 (1.496)	1.855 (1.496)	2.217 (2.646)
GINI×MIDIN	2.168*** (0.806)	3.069*** (1.101)	3.069*** (1.101)	0.721*** (0.259)	0.721*** (0.287)	0.573** (0.287)	2.887*** (1.102)	2.887*** (1.102)	2.491** (1.253)
GINI×HIGIN	2.977*** (1.051)	3.947*** (1.242)	3.947*** (1.242)	1.183*** (0.267)	1.183*** (0.332)	0.891*** (0.332)	3.727*** (1.192)	3.727*** (1.192)	4.022*** (1.447)
CRIME×LOWIN	8.68e-5 (5.35e-4)	2.38e-4 (6.07e-4)	2.38e-4 (6.07e-4)	1.01e-3 (9.41e-4)	1.01e-3 (9.41e-4)	1.291e-3 (1.26e-3)	1.65e-4 (1.33e-4)	1.65e-4 (1.33e-4)	1.67e-4 (1.23e-4)
CRIME×MIDIN	1.03e-3** (5.09e-4)	5.51e-4** (2.71e-4)	5.51e-4** (2.71e-4)	1.58e-3** (7.91e-4)	1.58e-3** (7.91e-4)	1.827e-3** (9.12e-4)	1.79e-4 (1.15e-4)	1.79e-4 (1.15e-4)	1.873e-4 (1.29e-4)
CRIME×HIGIN	1.26e-3** (4.91e-4)	7.08e-4** (3.46e-4)	7.08e-4** (3.46e-4)	2.37e-3** (9.37e-4)	2.37e-3** (9.37e-4)	2.077e-3** (9.79e-4)	2.24e-4 (1.46e-4)	2.24e-4 (1.46e-4)	2.49e-4 (1.64e-4)
Prov Dumm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Dumm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5406	5406	5406	1227	1227	1227	3490	3490	3490
Wald chi2	598.21	587.13	620.29	249.43	245.77	261.74	513.36	510.73	525.66
Pseudo R ²	0.1065	0.1079	0.1162	0.1022	0.1027	0.1159	0.1232	0.1209	0.1258

注：同表4。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WVS 数据在控制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之后,考察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1)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我国居民存在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厌恶,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在我国并不存在。(2)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的显著负面影响之外,还通过社会犯罪率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的产生负面影响。(3)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对中等和高等收入者的影响要显著地小于低收入者,甚至对高收入者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均有负面影响,但是只对城市居民显著。

据此,为了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政府的宏观政策应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降低社会贫富差距,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这对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给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积极的作用。(2)由于收入不平等给低收入者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政府应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政府社会性支出,给低收入者改善生活的空间,让所有国民,尤其是让穷人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除了以上两点治本之策外,还必须有效地控制违法犯罪活动的上升趋势,降低社会犯罪给国民主观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实现: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¹⁷

附录

(1) Gini 系数的测度

Gini 系数、泰尔指数、五等分指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指标,其中,Gini 系数的运用最为广泛。本文采用以家庭人均收入计算的 Gini 系数来反映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因为现行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分别按城镇和农村进行,由此只能直接分别计算出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 Gini 系数,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 Gini 系数则不能直接获取。鉴于此,本文运用 Sundrum (1990) 的城乡分解法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 Gini 系数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G = P_1^2 \frac{U_1}{U} G_1 + P_2^2 \frac{U_2}{U} G_2 + P_1 P_2 \left| \frac{U_2 - U_1}{U} \right|,$$

¹⁷ 见温家宝总理 2010 年 8 月到深圳视察时的讲话。

式中 G 、 G_1 和 G_2 分别表示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 Gini 系数, P_1 和 P_2 分别表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U 、 U_1 和 U_2 分别表示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满足数据资料在统计时间上的一致性, 人口比重与居民人均收入都按年末统计数计算。

(2) 社会犯罪的测度

在对社会安定产生冲击的诸多行为中, 以各种刑事案件的影响最大, 而且有关刑事案件方面的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较易获取。我们的研究以 1990 年、1995 年、2001 年以及 2007 年中国各省的刑事案件发生率 (起 / 十万人) 作为社会犯罪率变量的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事案件包括: 杀人、伤害、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盗窃、财产诈骗、走私、伪造、变造假币等。

参 考 文 献

- [1] Alesina, A., R. Di Tella, and R. Mac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9—10), 2009—2042.
- [2] 白雪梅、王少瑾, "对我国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安定关系的审视", 《财经问题研究》, 2007 第 7 期, 第 16—23 页。
- [3] 蔡昉,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5 期, 第 16—25 页
- [4] 陈春良、易君健, "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 2009 年第 1 期, 第 13—25 页。
- [5] 陈钊、陆铭,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 [6] Choe, J., "Income Inequality and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s Letters*, 2008, 101(1), 31—33.
- [7] Clark, A., P. Frijters, and M. Shields,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1), 95—144.
- [8] Davis, R., and L. Friedman, "The Emotional aftermath of Crime and Violence", in Figley, C. (ed.), *Trauma and Its Wake: The Study and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5.
- [9] Davies, S., and T. Hinks, "Crime and Happiness amongst Heads of Households in Malawi",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11(4), 457—476.
- [10] Demombynes, G., and B. Ozler, "Crime and Local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6(2), 265—292.
- [11] Di Tella, R., R. MacCulloch, and A. Oswald,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1), 335—341.
- [12] Di Tella, R., R. MacCulloch, and A. Oswald,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85(4), 809—827.

- [13] Di Tella, R., and E. Schargrodsky, "Happiness, Ideology and Crime in Argentine Cities", RES Working Papers 4645,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Research Department, 2009.
- [14] Easterlin, R.,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3), 465—484.
- [15] Ebert, U., and H. Welsh, "How do Europeans Evaluate Income Distributions? An Assessment Based on Happiness Survey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9, 55(3), 801—819.
- [16] Fehr, E., and K. Schmidt,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3), 817—868.
- [17] Frank, R., *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18] Frey, B., and A.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402—435.
- [19] Helliwell, J.,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ling*, 2003, 20(2), 331—360.
- [20] 胡联合、胡鞍钢、徐绍刚, "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05年第6期。第34—44页。
- [21] Kahneman, D., and A.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1), 3—24.
- [22] Kingdon, G., and J. Knight, "Well-being Poverty Versus Income Poverty and Capabilities Poverty?"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3.
- [23] 李实、佐藤宏, 《经济转型的代价: 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年。
- [24] 鲁元平、王韬,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评述", 《经济学动态》, 2010年第5期, 第125—130页。
- [25] Michalos, A., and B. Zumbo, "Criminal Victim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2000, 50(3), 245—295.
- [26] Milanovic, B., and L. Ersado, "Reform and Inequal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An Analysis Using Panel Household Survey Data, 1990—2005", SSRN Working paper, 2008.
- [27] Mo, P.,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1), 66—79.
- [28] Morawetz, 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elf-rated Happines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Economic Journal*, 1977, 87(347), 511—522.
- [29] Norris, F., and K. Kaniast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Various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ies on Criminal Victimization, Fear of Crim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2, 20(5), 625—648.
- [30] Powdthavee, N., "Unhappiness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Economica*, 2005, 72(287), 531—547.
- [31] Ram, 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Country Samples", *Public Choice*, 2009, 138(3), 483—490.

- [32] Ravallion, M., and S.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2(1), 1—42.
- [33] Sanfey, P. and U. Teksoz, "Does Transition Make You Happy?"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7, 15(4), 707—731.
- [34] Schwarze, J., and M. Harpfer, "Are People Inequality Averse, and Do They Prefer Redistribution by the State? Evidence from German Longitudinal Data on Life Satisfac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30, 2002.
- [35] Sorenson, S., and J. Golding, "Depressive Sequelae of Recent Criminal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0, 3(3), 337—350.
- [36] Sundrum, 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37] Tricomi, E., A. Rangel, C. Camerer, and J. O'Doherty, "Neural Evidence for Inequality-averse Social Preferences", *Nature*, 2010, 463(7284), 1089—1091.
- [38] 万广华、陆铭、陈钊, "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 第17—26页。
- [39] 王洪亮, "中国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分析——对区域收入位次变动强弱的研究", 《管理世界》, 2009年第3期, 第36—44页。
- [40] Wassmer, R., E. Lascher, and S. Kroll, "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Ideology Matter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9, 10(5), 563—582.
- [41] 吴一平、芮萌,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 《经济学(季刊)》, 2010年第10卷第1期, 第291—311页。
- [42]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
- [43] Yao, S., and Z. Zhang,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38(2), 167—186.
- [44] 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年。

Income Inequality, Cr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

TAO WANG YUANPING LU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using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data. Our re-

sults show that income inequalit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pecifically, the impacts on rural residents are higher than on urban residents, and impacts on low income earners are higher than high income earners. Moreover, income inequality can also create negative effects on peop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leading to more crimes.

JEL Classification I31, D63, A13